

路遥的道德追求

张连义

(菏泽学院 中文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为探究路遥的道德追求,以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城乡交叉地带个人奋斗者为切入点,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分析认为,作家之所以力图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长处,建立一种基于人情与人性的以“善”为最终旨归的完美道德;这与作家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人经历有关;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下价值的多元选择,路遥的道德追求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是其严肃的创作态度、执着的精神追求以及作品所洋溢的道德力量和诗性气质是我们享用不尽的财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路遥;传统道德;现代文明;善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4-0086-07

路遥的创作聚焦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变化,意在展示他们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情怀,其作品氤氲着浓郁的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充分显示出传统道德的魅力。正如有论者所说:“他不去着意开掘平凡世界中深藏在平凡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而是更多的关注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克服自身弱点走向自我觉醒的痛苦历程。”^[1]城乡交叉地带的个人奋斗者被作家置于人生十字路口进行命运的抉择,更是呈现出复杂矛盾而又深邃多变的灵魂。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对路遥的道德追求作一探讨。

一、路遥道德追求的内容

路遥总是把选材的视角对准城乡交叉地带,通过个人奋斗者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两难选择,表现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渗透与冲突,展示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道德的传承与冲突使作品始终氤氲着人情的气息,显示出道德的巨大感染力。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城乡交叉地带

不仅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更具有时间性的内涵。

作为一个地理性的概念,城乡交叉地带是指在农村与城市各自发展以及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之间相互交往与渗透以及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作为具有时代性意蕴的概念,城乡交叉地带是指社会文化转型激起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乃至思想道德痛苦蜕变与更新的历程。城乡交叉地带的人们一方面面临着城市现代文明的诱惑而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又承载着传统道德的重负而举步维艰。当他们置身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其思想斗争更为剧烈。当经历由乡入城时,他们的人生命运与道路选择也就超越了个人奋斗的狭小视阈而具有了社会性的意义和道德哲学的意蕴。

当代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是路遥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乡入城的个人奋斗者在其创作中更具有典型意义。路遥对它的理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益广泛,加之

收稿日期: 2010-04-22

作者简介: 张连义(1973-),男,山东聊城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生。

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2]他们大都是出身于农村且受过一定教育的有志青年。他们身上有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双重特质,作家对此了解得特别深刻:“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2]由于农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也就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特点。他们既肩负传统道德的沉重负担又对现代文明苦苦追寻,认识到现代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传统道德的怀疑与对现代文明的痛苦接受构成其特定的心理态势。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在生活方式的转换中经受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的剧烈冲击并面临情感与理智的两难选择。高加林是一个出身农村的有志青年,怀着美好的向往与激情“挤”进了城市。生活的变化带来了精神的折磨,使他陷入感情的痛苦:他既对刘巧珍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又明显地感觉到两人之间文化不同与环境差异所形成的差距,最后他理智而痛苦地选择了黄亚萍。当“走后门”的真相被揭穿时,他又不得不离开黄亚萍——他们已经失去了在一起的条件,重新回归黄土地。其实,无论是在刘巧珍与黄亚萍之间的选择还是最后对黄亚萍的割舍,高加林都面临着两难选择,实际上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对黄亚萍的取舍,更显示出其理智的一面:这时的高加林已经失去了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只有黄亚萍还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可是他知道:黄亚萍不会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吃不了那么多苦。他只能选择痛苦地离开。在黄亚萍的取舍上,高加林始终受着理性的控制。可是一旦回到黄土地忏悔的时候,他又否定了自己:真正爱自己的是刘巧珍,“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一点,但会活得很幸福的……现在他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2]这时,他的情感又战胜了曾经的理

性,表现出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徘徊。到了孙少平,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不再是冲突而是和谐。他身上褪去了高加林的浮躁而且多了个人奋斗的勇气与毅力,也多了道德的自律,或者说达到了个人价值追求与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无论是对郝红梅偷东西被抓住的解救还是对打工时遇到的遭受凌辱的小女孩的营救与同情,都是既符合现代文明的人道主义又符合传统的“宽恕”、“仁义”思想,表现出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一致性,也体现出人情美的追求。

其实,正是因为这些农村出身的个人奋斗者由乡入城的经历与挣扎,才会有传统道德遭受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所谓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正是个人奋斗者在城乡角色转换过程中性格充分展现以及复杂的心理流变与道德冲突的场所。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必然要经历痛苦蜕变的过程,面对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必然要对固有观念作出调整与扬弃。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碰撞与冲突集中表现为个人奋斗者在农村与城市生活渗透与冲突的人生十字路口面临的两难选择,而这也正体现出作家对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的审慎思考和情感倾向。

“具有普遍内容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通过教育、评价、舆论等等的提倡、引导,逐渐成为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势。”^[3]作为世代受压迫的穷苦农民,他们骨子里的“服从意识”使其一旦接受了一种道德观念就很难改变,历史上陕北一直封闭的环境更使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不过,作为农村出来的年轻一代毕竟受过现代文明的熏染,具有了一种不同于祖辈父辈的现代意识与精神追求,于是挣脱乡村的束缚与接受现代文明就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高加林被剥夺教师资格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土地上的金子——刘巧珍走入他的生活并给予他安慰。但是即使在热恋时,高加林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并对其与刘巧珍的关系产生质疑:“高加林每天都沉醉在这样的柔情蜜意里,一切原来的想法都退得很远了。只是有些时候,当他偶尔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上奔驰而过,雪白的的确良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惬意身影时,他的心才又猛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翻上心头,顿时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4]。“她(指刘巧珍——作者注)的爱情和温存像往常一样,给他很大的安慰。但是,已不能完全冲刷掉他心中重新泛起的惆怅和苦闷了。过去那些向往和追求的意念,又逐渐在他心中复活。他现在又强烈地产生了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

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他虽然这样想,不知为什么,又不想告诉巧珍”^[4]。即使进入城市,积习日深的乡村道德仍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使他们在奋斗过程中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更何况那种传统道德往往是以感情作为外衣呢。由城返乡时,他们又感受到乡村特有的质朴深情,体会到传统道德的浑厚力量,马上又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与否定。其实,这种环境的转换更能说明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高加林最后回归土地时的忏悔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道德问题上,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选择的不同。正是因为作家没有给我们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而是如实描写,我们才体会到类似高加林的人们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痛苦与挣扎,领会到生活的复杂和判断的两难。个人奋斗者面临农村与城市生活的两难抉择,显示出作家对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的复杂心态。

现代文明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高加林进入城市选择黄亚萍抛弃刘巧珍以及孙少平背负行囊在城市打工的决绝姿态,正说明了现代文明作为历史潮流不可抵挡的力量。不过,路遥对现代文明有着自己的认识。高加林选择黄亚萍是以牺牲刘巧珍为前提的,孙少平追求的最终结果也不过是在煤矿找到一份工作并为此付出毁容的代价。更令人遗憾的是,与孙少平热恋的田晓霞夭折了生命,这一切都似乎暗示着现代文明的理性和无情。最极端的例子是杜丽丽为了崇拜的古风铃不惜伤害武惠良,幸福的婚姻变成了两个人的痛苦煎熬。现代文明尽管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其对理性的追求和个性的张扬又伤害着人情,冲击着固有的伦理生活。作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由此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本能的排斥。

传统道德是农耕文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以“礼”、“仁”为基础的传统道德遭遇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传统道德的脆弱性暴露无遗。高加林背叛刘巧珍的内疚反映出其对传统道德的留恋,也显示出传统道德的脆弱;对黄亚萍的选择既显示出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也凸显出理性的无情。最后高加林回归土地真诚忏悔,又显示出传统道德的巨大包容性与感染力及其在维护和谐人情方面的巨大作用。正如作家所言,“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2] 贺秀

莲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她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她提出分家的要求乃大势所趋,但与孙少安的隔阂也由此产生。当孙少安的事业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农民企业家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又会怎样呢?这是作家所不想面对的。贺秀莲进入坟墓的悲剧结局,反映出作家对传统道德的留恋与无奈告别。

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制约人们行为处世的规范,道德有着历史的沿袭性与传承性,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现代文明,对人情的赞美与人性的歌颂都是其应有之义,对“善”的褒扬更是其核心的部分。无论是背负着传统道德的个人奋斗者还是具有现代文明追求的青年都体现出作家对“善”的发自内心的歌颂与追求,表现出世俗社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被遗弃后仍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小丽年近多病母亲的具有更多传统意识的高大年一家以及具有了一定现代文明意识的为他人着想的卢若琴、田晓霞,都体现出巨大的道德感染力。我们很难用传统道德或现代文明来概括他们的道德取向。其实,他们在对人情美的追求中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时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是统一的、和谐的,显示出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路遥正是由此使我们感受到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净化人的灵魂、塑造人的品格和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谱写出一曲曲人情美的颂歌。

路遥既认识到传统道德在维护和谐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又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既认识到现代文明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益处,又认识到它对人情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破坏,于是便转向传统,试图以传统道德的人伦来拯救现代文明发展中日益沦丧的道德和人受制于“物”的尴尬,从而形成以传统道德为底色、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的“善”的追求,目的在于通过个人道德完善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对路遥道德追求的认识

路遥的道德倾向是以民间道德为底色,体现为倾向传统而又掺杂了现代文明的“善”的追求。必须将路遥的道德追求放置于具体时代,才能对其作出比较合理和科学的认识。

路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40多年的历史,他写作的时空跨度主要是文革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就是说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从文革到新时

期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是传统道德遭遇着剧烈的冲击,但还有着广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文明以不可遏制之势冲击着固有的传统伦理,但因其对理性的过于强调也受到质疑。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构成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潮,也是作家描写的重点。

中国的传统道德基本上主要是以儒家价值伦理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是一种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规范。作为制约人们思想的力量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度”,传统道德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进入阶级社会,它自然地演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为政治服务成为它的主要特点。到了春秋时期,靠伦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孔子提出了以“礼”、“仁”为核心的儒家规范,并从理论上构建起以“人伦”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标准。战国时期孟子又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仁政”学说,使政治渗透了更多人伦的因素。可见,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人伦的。到了汉朝,董仲舒提出“大一统”的思想,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使儒家思想由重人伦过渡到重天伦。“儒学成为官学之后,孔子思想中统一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发生了裂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异化。在这种条件下,伦理道德便由人性的家园蜕变为人性的桎梏。”^[5]也就是说,儒家伦理产生之始是以家庭人伦为核心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因此,我们也应当辩证地去看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既要看到它在维护封建秩序方面所形成的压抑人性的礼教传统,也要认识到它重视人伦、维护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和正常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儒家伦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就如有论者所说“处当今之世,儒家的生命力或许也并不在于一般地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在于基于某种人性、人道、人文的立场对于社会的发展进行某种理想性的批判。正是此种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为儒家提供了存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6]。

现代文明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的束缚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理性,强调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思想领域,标志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解放”的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重视理性与个人价值的工业文明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在强调对个人价值与理性尊重的同时也破坏了固有的人情与和谐的社

会关系。现代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过去那种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以“物”为中心,人们围绕“物”生产和生活。这样,人就由“物”的主人蜕化为“物”的奴隶。无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资本挤压下人的异化的强调还是哈贝马斯、韦伯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人的“物化”的担忧,乃至后现代理论家对资本生产的压迫性无所不在的强调,都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文明弊端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对现代文明不加甄别地一概否定,因为它毕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它所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和所唤起的对人的尊重,在任何时候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实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每当社会进入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总要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新的评判思考”^[7]。

麦金太尔也认为存在2种不同的道德观,他称之为“规则的道德”和“德性的道德”,前者是现代式的道德观,后者是古典式的道德观^[8];新儒家也把道德分为“理性道德”与“德性道德”。这种划分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有时称为现代文明)。传统道德重视的是人伦、感情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现代道德重视的是实用、理性和个人价值的尊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传统道德或者说是德性道德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强调人伦、重视人情是其基本内容,所以从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中国至今,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调和从未间断。不过由于自清末开始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状态,且现代文明又与机器工业联系在一起,传统道德也由此大受诟病,甚至在部分人那里成为落后的代名词。

传统道德确实有着压抑人性的一面,但它在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人伦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概的批判也不是科学的态度。面对道德沦丧和工具理性对人情的破坏,新儒家对孔孟的思想作了重新阐释和发挥,努力寻找和重新阐释儒家道德在当今社会的合理性存在与意义,试图以此挽救“物化”的人与社会。在这一点上,路遥与新儒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相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道德有着极强的兼容性,现代文明理应而且也能够为儒家思想所用。东亚工业文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东亚工业文明的出现或许并不表明儒家伦理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它却再一次证明儒家思想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它能够很快寻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能够成功的吸收和同化西方体制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东亚工业社会的发展还表明:传统与现代

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东亚社会中对现代契约关系与传统伦理关系的并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5]。路遥既认识到现代文明历史进步的一面,也认识到它在促进物质进步的同时对人性、人情的戕害。于是路遥就转向传统,试图以传统道德的人伦拯救现代文明过程中道德的下降。路遥对高大年、刘巧珍、田润叶等人身上传统美德的发掘就是明显的例子。

路遥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有着现实的进步意义。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理想社会的构建是以对个人的压抑为基础的。田润叶在对孙少安念念不忘的同时却伤害了向前,向前残废后田润叶母性的闪光更是以其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另外如巧珍、兰花等在恪守传统的同时也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限制了她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作家对传统道德的留恋却要以个体的利益甚至幸福为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就如有的论者所说:“……另一个问题是精神上的,陕西作家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题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具体地说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自由意识。”^[9]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着戕害人性的一面,但它毕竟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也使个人价值获得尊重。工具理性的张扬对固有秩序的破坏起了重大作用,也有着现实的可行性。高加林与黄亚萍的婚姻确实有违传统的德性道德,但是高加林的工具理性毕竟代表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郑小芳与薛峰的遭遇总给我们留下深深的遗憾。由此看来,作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非完全出于理智。

正是由于对传统道德过分留恋、恪守和对现代文明的理性认识,作家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并最终作出了无奈的选择。儒家伦理特别强调个人道德的完善,把道德完善作为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这种德性追求与个人修养的关系也成为儒家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对存在完善的追求,当然并不仅仅是一个成己的过程。作为德性基础的真实存在或具体存在,既是一个个的个体,又具有社会的规定(与人共在),存在的完善也相应地涉及成人与成己的关系问题。”^[9]作家笔下的完美人物总是兼顾着自身修养与行善之间的关系,把成人成己作为最终的追求。作家在发掘传统美的同时,也有刻意追求的倾向并最终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偏颇。这既是作家自身原因,也是时代的局限。

三、路遥道德追求的成因

一个作家道德取向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它是民族、环境、时代、个人经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源于这几种因素的合力。

第一,民族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农本文化,主要特征就是对亲情、人情的注重。中国古代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陕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因此,陕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道德的恪守也就更为典型。传统道德已化为无意识,积淀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正如泰纳所说,它是“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创作中始终存在的特征”^[10]。民族性的烙印是路遥道德倾向的首要因素。

第二,地域环境。路遥出生于陕北。历史上,陕北一直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域,也是二者的一个过渡带。汉胡在此杂居通婚形成“具有‘胡气’的汉族”。“具有胡气的汉族是什么意思?就是由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共同哺育和塑造起来的,具有特殊气质,特殊性格,特殊心态,特殊生活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汉民族形象。”^[11]从民族意识来说,这里的人们具有了“胡人”的特质。因此,陕北这个特定地域的道德意识中也少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束缚而具有了更多北方少数民族的追求自由豪放的特质,在对传统道德恪守的同时又具有了对自由的追寻与向往。如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里引用《七笔勾》所说:“……塞外荒丘,土鞑回蕃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12]。北方少数民族的意识中少了汉族正统的伦理道德而多了个性的张扬,受其影响,封建礼教在这里的影响必然大大减弱,“胡人”的豪爽和不羁则有了更多的表现。

第三,时代背景。路遥写作的时代与表现的内容基本是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阶段。此时,一方面传统道德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现代文明作为新锐的力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传统道德在本质上是以群体消融个性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注重的却是个体价值,二者的固有矛盾决定了社

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人们必然面临着道德判断的两难选择;西方价值的重理性和中华民族的重感情更是使这种冲突表现为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选择。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现代文明,在对人的价值与生命的关注,对“善”的追求上又有着一致性。于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中又有着共同的内容。路遥一方面对传统道德表现出固有的留恋,对传统道德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保持美好人性人情方面表现出认同和向往;另一方面又理智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于是只能向传统道德作痛苦的告别,对现代文明则加以理性的审视与审慎的接受,这就有了他倾向传统的道德意向。这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善”的追求。

第四,作家的个人经历。路遥出生在山旮旯里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求学之路。农村出身的他受到传统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艰难生活中的人间真情使其对传统道德更加留恋。在求学期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路遥不自觉地参与了进去。这段经历既是荣耀,也是苦痛。在路遥的成长过程中虽然经历的是社会困难甚至动乱,在当时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几乎成为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就如郭小东在《中国知青部落·序言》所说:“我们曾经非常欣慰地告白于天下,我们的一切苦难都产生于利他的意愿理想。我们的一切憧憬,都与渺小的猥亵的人生目的无关。即使是曾经沉沦和已经沉沦,我们也将对着这个世界执拗地争辩:我们真诚而且真正地活过了!因为我们的受难,是集体的受难,我们没有个体也不需要个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也自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耀”^[13]。这种知青情结自然也会影响到包括路遥在内的一代青年,对其向“善”的追求起了巨大作用。后来,路遥进入延安大学,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俄法等作家的宗教意识、平民意识、苦难意识、人道主义自然影响到道德的形成,其思想中不自觉地渗透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受到剧烈冲击: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道德水平却有了明显的下降。有着忧患意识的路遥不能无动于衷,自然会想到传统道德的力量,这就有了他倾向传统的道德取向,具体表现就是对传统道德的留恋、对劳苦人民的关怀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清醒认识与痛苦接受。

作家经历了一种不幸的人生,这使他对人情渴

望特别的强烈,对人性的追求特别的执着;耳闻目睹下层人民的辛酸生活又使其有了更多的同情与悲悯意识,具有了犹如俄国作家宗教式的人文关怀,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善”的刻意追求。“善”本身就是传统道德的应有之义,现代文明也与此有很多相同之处,作家在这里找到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共同点,使得作品具有了人性的光辉。传统道德确实在维护人情与人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现代文明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却又有工具理性戕害人性的一面,二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作家创作的一个核心,这就是路遥作品中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痛苦的思想蜕变过程和一代青年在人生道路上的两难选择与痛苦挣扎。

总之,民族传统、时代背景、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独特的个人经历形成了作家以传统道德为底色,以现代文明为参照,试图通过个人道德完善建构和谐社会关系的向“善”追求。

四、路遥道德追求的意义

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他的道德取向具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大有裨益。

第一,社会意义。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读者写。在路遥的创作中始终灌注着对农民的深切感情,“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难与困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8]。农村出身的作家始终关注着农民的命运,把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苦难与奋争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道德冲突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笔下的农民淳朴、善良,显示着传统道德的存在甚至魅力,体现出浓郁的人情美,对于现代工具理性对人伦情感的冲击以及物欲压迫下的道德沦丧无疑起着救赎的作用。

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也是价值标准混乱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欲望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在人们满足个人私欲的同时,也对社会甚至他人造成了损害。道德下降固然有着社会和时代的诱因,但知识分子也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社会使命的今天,作家自觉承担拯救社会的

责任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其作品所洋溢的“利他”倾向以及重义轻利观念无疑起着感召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第二,文学本身的意义。在物欲冲击下,新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人文知识分子传统,丢弃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味沉浸于私人生活的狭小天地或局限于欲望化的书写。自觉肩负起知识分子责任与道义进行写作的作家凤毛麟角,而路遥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路遥的作品始终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生,关注着人们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关切。他不是以超然的态度显示着自己的清高,也不是以嘲讽、反叛的文字做社会的看客,而是直面现实,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如实地描写世俗的人生。令人欣慰的是,所谓的欲望化写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真实反映现实和人生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不是书写欲望,也没有色情描写,同样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善”的向往和自强不息的追求。欲望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主流并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甘愿这样,而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指导。当知识分子失去社会责任感之后,留下的只能是道德领域的空白。此时,视知识分子为价值标准的广大人民自然失去了道德的判断与自律,也不再相信知识分子崇高的神话。这种情形下,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和道德自律就更显珍贵。

路遥坚持崇高的精神追求,作品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高加林、孙少平、马健强等一系列个人奋斗者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在当前价值混乱的时代,人们应该怎么做以及做什么,路遥的作品无疑具有借鉴意义。路遥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拼搏精神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一直为世人所景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作家学习西方现代派手法的时候,路遥坚信现实主义没有过时,他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创作道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力求做到真实地再现现实。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深入矿区,大量地翻阅报纸……终于,他倒在文学的征途中。路遥这种严肃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追求,对当代作家无疑是一个鞭策,对广大读者无疑是一个鼓励。作家这种严格的道德自律以及作品所洋溢的道德力量、诗性氛围以及认真、执着的创作态度,是我们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第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谐社会的

核心是“以人为本”,不仅尊重个体的人性与人情,还要建立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冲击着本已脆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要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以健全的道德弥补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传统道德对人性完善的追求与现代社会对人道主义的张扬在此发生对接。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时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就有着吸收传统道德的积极因素弥补物欲横流的当下道德缺失的思考。路遥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又对其工具理性导致的道德沦丧有着清醒认识,试图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优点,张扬起“善”的大旗,挽救世风日下的道德。由于文学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和审美功能,因此更易于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路遥作品就拥有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广大读者群,其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更容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五、结 语

总之,路遥以自己的热情与心血创作出大量广受欢迎的作品,人情的赞美与诗性气质感召着每一位读者。人情与诗意的追求渗透出作家的传统道德倾向。其实质是以传统为底色,以现代文明为参照,试图通过个人道德的完善,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善”的追求。由于时代和作家自身条件的局限,路遥创作的道德取向有着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但其严肃的创作态度、执着的精神追求以及作品所洋溢的道德力量和诗性气质却是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承华. 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 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J]. 小说评论, 1994, 10(1): 36-40
- [2] 路遥. 路遥文集[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3] 杨国荣. 伦理与存在: 道德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4] 路遥. 路遥精选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6
- [5] 刘蔚华. 儒学: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J]. 孔子研究, 1998, 13(3): 4-12, 22
- [6] 郑家栋. 断裂中的传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7] 王振勋, 李志娟. 中西文化碰撞之必然趋向[C]//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 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9

(下转第 101 页)

使得作品产生了很强的魅力,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1949年,由于“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福克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参考文献:

[1] 吴伟仁.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1990

[2] 王长荣. 现代美国小说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3] 刘海波. 南方失落的世界[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4] 肖明翰.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3(1): 75-81.

Faulkner's unique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ose for Emily

AI 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ulkner's writing style, his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is analyzed from three angles of vivid characters, unique writing technique and profound theme.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author uses concise writing style, unique structure and metaphor to create a complicated character Emily,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traditional forces and traditional values during the Civil War. Analysis of Emily's tragedy reveals the patriarchal system, slavery, racism and Puritanism.

Key words image; sequential inversion; metaphor; symbolism

(上接第 92页)

[8] 胡辉杰. 路遥: 德性的坚守及其偏至[J]. 理论与创作, 2004, 17(2): 70-74.
[9] 李建军. 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C]//惠西平. 突发的思想交锋[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1.
[10]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88

[11] 田中阳. 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 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观陕西作家群[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7(1): 72-79.
[12] 高建群. 最后一个匈奴[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3
[13] 郭小东. 中国知青部落[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Morality of LU Yao

ZHANG Lian-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LU Yao's works has a focus on cross-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he grew through the social transition, he chose to demonstrate the inevitable clash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writer tried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morality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s strengths is that he wanted to establish a thought for considering human nature as "goo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LU Yao; traditional morality; modern civilization; good